漫话登州中学堂

□张世峰

从本质上讲，晚清实行的官办学堂制，是清廷在风雨飘摇中为了维系皇权统治，而被倒逼出来的“扶大厦于将倾”的无奈之举。但从客观上看，官学改革加速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，也在实践中推进了地方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，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式人才。如果说美南浸信会传教士在登州举办育英女子中学、美北长老会在登州开设文会馆，开启了“西学东渐”教育模式的启蒙之旅，那么当局主导的官办学堂则对“中体西用”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殊途同归，双流汇聚，联袂奠定了烟台教育现代化的首开之功，不可遗忘和抹杀。

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清廷颁布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（亦称“癸卯学制”）变更学制，规定县办小学堂，府办中学堂，省办高等学堂，京师办大学堂。是年，登州知府瑞谨（时任湖广总督瑞方之弟）将位于西关铁门北大街迤西的君子洲畔瀛洲书院改办为“官立登州中学堂”。由于动了私塾的“奶酪”，加之风气不开，坊间盛传“学堂不是好学生去的地方”。受舆论影响，官立登州中学堂当年首招并不理想。尽管无需考试，报备后就算入学，开学时学员仍不足30人。生源以蓬莱当地居多，黄县、文登、荣成各县也有几人。知府亲任校长，书院山长教授国文，府学两名教官为督学，同时开设历史、地理、英文等课程。学堂预备宿舍，伙食由学生自理，书籍、文具也由学生自购。当地学生每周六下午回家，周日下午返校。返校时，自带米面油盐，分组轮流做饭。有学生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学堂环境优美，柳岸荷池，山明水秀，课暇散步，精神愉快！”

翌年秋，知府调换，新任者是吴筠孙（字竹楼，江苏扬州人士，二甲进士第一名传胪出身）。其人富有，为保障子侄学业起见，到任后自请英文、数学教员，充实师资，公私兼顾。同时，他认为瀛洲书院为府属文人学士进修之所，长时间占用书院的地方于理不合，因此选择城内北大街路西草桥南贺宅及比邻三家之宅，改建为中学堂。转年五月学堂竣工，改造修缮讲堂40余间，新建学生宿舍30余间，学生增至70多人，府属十县学生齐聚。伙食由学堂供给，每日三餐均由饭馆送达。吴知府循例续任校长，新聘文登县名孝廉孙阑升为国文教员。体育教员姓陈，为水师退役军官，并派来候补同知陆淦为管理员。学堂新政引领教化之先锋，社会上流传的学堂污名涤荡一空，学生精神和学堂声望大振。

袁世凯幕僚、近代文史名家闵尔昌听说登州中学堂新馆落成，欣笔做《登州府中学堂碑记》（全文刊于《南洋官报》），盛赞官民携手募款新建登州中学堂义举，阐述面对列强环视，要通过办学堂与其智争。碑文曰：“登（州）人士既负有厚重之材质，吾知精心果力，方来之成就，必非徒尚虚言，不崇实践者，所可同日而语。”能得到自视甚高的尔昌公如此评价，实属不易。

也许人们最好奇的是，一百多年前的课堂教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？对此，登州中学堂首批学员、家住蓬莱城西街（今钟楼西路）道南的孙继丁（字炳炎）在1976年（时年90岁）撰写的《九十回忆》自传中这样描述：“国文孙老师讲解明晰，对学生作业批改亦甚认真。他坐在大讲堂当中，学生坐在两旁，右为高等班，左为寻常班。学生作业时，有时写作，有时朗诵，沉寂之时他时常讲笑话，提振学生的精神。功课紧凑，学生不准请假。因为在瀛洲书院时期，常有人在学堂数月，即有请假一去不复返者，所以学堂精神散漫。”

迁入新址后，学生一律住宿，管理严密，每日早晨六时起床，盥洗后迅疾至讲堂自修一小时，七时三十分早餐。八时上课，上午四节，十二时午餐，休息至午后一点上课，下午也是四节，中有体操。下午五时后休息，六点晚饭，七点上课自修，十时熄灯就寝。每日在课堂读书时，每位学生就其心得写手记一则。星期日休假，国文老师命题，学生均作文一篇。手记、作文老师都详加批阅。每月终学堂将全体学生一个月的手记和四五篇作文呈送府衙。吴知府亲自批改学生课业中的错谬和瑕疵，老师批阅有误之处，也予以匡正。如此这番甄别，学生无不用功上进，老师也尽心育人施教。年终考绩时，吴知府自己主持，终年勤奋者记大功，学业进步特优者也记大功。每月对国文、英文、数学和体操举行月考一次，以此为据将全体学生分高等、寻常两班并榜示。每门功课名列前三名者有奖金，第一名奖清钱五百文、第二名二百文、第三名一百文。这一年间，学生进益很大，府衙的门槛在学生的心目中也不再那么高高在上，顿觉平实。

为稳定师资队伍，府衙和县衙统筹，在密汾桥北街和县后路交汇处及密汾桥北街东的育德巷划拨土地，用公币置办官宅，安置小学堂和中学堂的教职人员。费用根据府、县拥有的栋数按比例分摊，五年内建设教师住房近30栋，建筑面积大于其他公职人员。服务官学十年以上可入私宅名下，当时蓬莱最气派的官宅都是教师之家。1947年冬，土改复查时，这些房子又化私为公。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初，吴知府奉命游宦泰安府，继任者为萨尔图·英寿，满正红旗，督抚英翰之弟。新官上任未有“烧三把火”，学堂之管教一切率由旧章，只是学生的作文、手记不必再送府衙批阅。是年夏，山东巡抚杨士骧巡视鲁东，名曰阅边。路经黄县，经由蓬莱县东南乡宫家庄村（现烟台市蓬莱区大辛店镇境内，解放后划分为东、西宫家庄两自然村），直达当时福山县属之烟台。英知府闻讯后，遴选登州中学堂十余名优秀学子带往宫家庄巡抚行辕，以展示其所办学堂成绩斐然。杨巡抚命其随员口试学生英文，学生们均高声回复。当问及孙继丁的籍贯时，他一时心慌，误听为问的是英文老师之籍贯，即答：“青州。”考官当下问英知府，登州中学堂还有客籍学生？答“无”后，考官反问，这位学生说他是青州人士。知府打圆场回复道，登州人口音敦厚，“登”与“青”发音不分。巡抚听完考官汇报，走出内室宣布奖励举措：“下学期他们可以到省高等学堂去就读，在登州中学堂恐耽误他们学业进步。”回蓬莱城后，知府得意之余请各位老师至府衙出席宴会，剧社演戏助兴，学生们也在受邀之列。筵席散后，知府还嘱咐学生们随时可以到府衙来，他会指导大家出门见人的礼仪。是年秋的开学季前，知府和教师商酌送四人进省城。他们是荣成县的李憝堂，蓬莱县的王如会、曹秉枢和孙继丁。八月中旬知府令他们启程进省，由公家发给每人路费纹银十两，知府本人又以校长身份赠送每人清钱五千文。蓬莱至潍县骑牲口驮行，用时四天；潍县至省城乘胶济铁路火车，半日抵达济南站。

其中，孙继丁于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山东高等学堂正科二类三班毕业，奖给中书科中书，参加清华学堂留学甄试获备取资格。翌年正式入清华学堂，不久获第三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，入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机械系攻读电气工程，成为蓬莱第一位公派留学生。同行的登州籍留学生还有福山的史译宣（竹斋）、张福运（景文）和威海卫的孙学悟（颖川）。

1912年1月，同盟会光复登州，民国政府颁《壬子学制》，“官立登州中学堂”改称“登州中学堂”。1913年4月撤销登州府，蓬莱县直属山东省，翌年“登州中学堂”奉命改称“山东省立第八中学”，校址迁至东街（今钟楼东路）道北考院（明称察院）处。当时，山东省共设省立中学十所，山东省立第八中学为鲁东最高学府。

从本质上讲，晚清实行的官办学堂制，是清廷在风雨飘摇中为了维系皇权统治，而被倒逼出来的“扶大厦于将倾”的无奈之举。但从客观上看，官学改革加速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，也在实践中推进了地方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，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式人才。如果说美南浸信会传教士在登州举办育英女子中学、美北长老会在登州开设文会馆，开启了“西学东渐”教育模式的启蒙之旅，那么当局主导的官办学堂则对“中体西用”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殊途同归，双流汇聚，联袂奠定了烟台教育现代化的首开之功，不可遗忘和抹杀。

（鸣谢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蔡玉臻副会长提供蓬莱教育大事记、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黄爱杰博士提供背景资料）

有趣的『贴晌饭』

□孙瑞

贴晌饭由来已久。白居易任关中盩厔县尉时，在《观刈麦》里记载了麦收时节“贴晌午”的情景：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妇姑荷箪食，童稚携壶浆，相随饷田去，丁壮在南冈。”女人挑着盛饭食的竹篮，小孩子提着装着汤水的陶壶，给收麦人送“贴晌午”的餐饮。那时，两顿饭的饭时，以正午时分为“晌”，正午之前的叫“早晌饭”，正午以后的叫“后晌饭”。正点饭之外的加餐，多在农忙活重的时节，即“贴晌午”。

“贴晌饭”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在广大农村田间地头的一道风景；是生产队为收割小麦的社员安排的一顿加餐，又称“第四餐”或“百家饭”，类似今天的下午茶。

吃“贴晌饭”场面生动，妙趣横生，回味无穷。

“九成收，十成掉。”过去，夏至一到，随着一声声婉转悠扬的鸟鸣声，农村麦收开镰了。

为把熟到八九成的小麦迅速抢收回家，生产队队长在会上再三强调：三夏稍纵即逝，麦收丝毫不能懈怠。大家今天磨好刀，明天开镰！

随着队长的一声令下，麦收战役的“第一枪”打响了。

天刚放亮，社员们各自带好镰刀、磨刀石、水壶等工具，从山地开始再向洼地逐一排开，开镰收割小麦。趁太阳还没露头，图个凉快，抢时间，赶速度。从早晨四五点钟开镰，六七点钟吃早饭，干到上午十一点再收工午休。

下午一点继续收割，到三四点钟，人已经累得东倒西歪，人仰马翻，再也没有一点力气了。这个时候，男女社员抬起头来齐刷刷地望着村口，盼望送“贴晌饭”的人冒个头，露个影。

忽然间，老远处的山间小路上出现了一位推着独轮车的年长者。他步履蹒跚地推着饭，朝着麦田走来。

“贴晌饭”飘着袅袅炊烟般的热气，变幻着曼妙的舞姿，把田野长空浸染出“隐隐飞桥隔野烟”的悠远诗意。

“吃饭喽……”

生产队长似乎闻到了饭香，吊大嗓门地喊了停工命令。送饭的小推车摇摇晃晃，刚到地头还没有停稳，呼啦啦的人便蜂拥而至围了上来。

三四十种不同风味的饭食，交织在一起，碰撞出几十种诱人的香味儿，味蕾神经一触而动。饥肠辘辘的社员们，前肚皮快贴到后脊梁骨上了，争前恐后地找着自己的饭食。

“二爷爷，这竹篓是俺的”“二叔，把红包袱给我……”“大家别急，仔细点拿，别把汤撒了……”

那时候，家家条件都差不多，没有什么贫富差距，只是每个家庭的生活之道不同而已。

人困马乏的社员们纷纷丢下镰刀，一屁股坐在充盈着青草气味和淡淡麦香的麦捆上，用毛巾擦着汗，有的在大褂巾上蹭汗珠。

一位刚结婚的小媳妇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不慌不忙地把一口水喷在手上，搓了两下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小手帕擦了擦，文绉绉地吃起“贴晌饭”。只见她露出小白牙，咬一口透暄透暄的大白饽饽，再用小勺舀一块白豆腐，一笑一颦，宛如“豆腐西施”。

那时，不是人们不讲卫生，而是根本没有地方洗手，即便有小河沟，也得跑出去老远。割麦子本就累得精疲力尽，谁有闲工夫去洗手，干脆往衣服上蹭蹭。俗话说，不干不净，吃起来没病。

母亲给我送的是猪肉炖宽粉条子。为了能把粉条的美味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效果，我故意发出“哧溜哧溜”的声音，时强时弱，就像一曲优美动听的田野交响乐。旁边的三哥喜欢大葱蘸酱，咬一口大葱，再蘸一口酱，也滋得一塌糊涂。还有人把绿皮咸鸭蛋的顶部撬开口，用筷子夹，鸭蛋黄流着油，也挺馋人。不知谁家送的虾酱香椿炒鸡蛋，老远就飘着诱人的味道……

我和几个刚刚下学的年轻人聚在一起，边吃边打打闹闹。有的学个鸟叫，有的吹个“阿飞哨”，有的偷偷往女生头上放穗麦穗。其他社员们也三五围坐，谈笑风生。

吃完饭后，一位漂亮的姑娘凑到一位刚刚回家的退伍兵面前，偷偷塞给他一根从家带来的嫩绿黄瓜和一个鹅蛋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来，我的镰刀不快了。”兵哥哥呆若木鸡，受宠若惊，哪还有心思磨刀，一不小心，手上划了一个大口子。姑娘看见了，心疼地拽着他的手，撕开手绢给他包扎伤口。

这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乡村爱情最原始、最质朴的一段。

饭后，打头的开始伸刀开镰了。大家一字形排开，又生龙活虎地割起麦子来。身后的麦捆如酒壶一样立在那里，一片金黄，一派丰收景象。

我是第一个“败走麦城”的人。

“贴晌饭”后刚割了半个小时，我的右手掌开始剧烈疼痛起来，腰累得又酸又疼。直起腰来抬头看看望不到头的麦垄，有种绝望的感觉，觉得何时才能割完呀！伸开右手一看，手掌上磨出了两个黄豆大小的血泡。

队长和我家关系很好。计划经济时期，他经常托我在县委工作的父亲买点紧缺物资，所以，一来二往，他挺照顾我。队长让我把收割的麦子捆好，马车来了再装马车，这样，我就不用弯腰驼背挥刀割麦了。

晚上收工后，回到家，母亲先把针在煤油灯上烧一烧，消消毒，然后把我的血泡挑破。红色血水淌了出来，疼得我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儿。

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如今，一提起割麦子，我就头皮发麻，心里打颤，又胆怯又头疼。

如今，农村全部实现机械化，仅仅半个小时，几十亩地的麦子便颗粒归仓。大袋大袋的麦子堆放在家里，只等着晾晒了。农民再也不用为麦收繁忙而发愁了，当年的“贴晌饭”也“寿终正寝”，无影无踪。

如今，有的吃“贴晌饭”的人走了，有些事过了、淡了、忘了，唯独一抹淡淡的、暖暖的、悠悠的、长长的乡愁，萦回在我们的记忆中，永远挥之不去、忘之不却。

“贴晌饭”，是夏日里田野里的一道风景，是丰收曲里一段优美的乐章。

千古流芳：一门三代六进士

□赵培策

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在古代，如果考取一名进士，十里八乡都会为之骄傲和自豪。然而，笔者这里撰写的福山区门楼街道两甲庄村，明朝时期孙氏一门祖孙三代科举相接，金榜联芳，考取过六名进士，个个国之栋梁，可谓千古流芳。爷爷孙遇为官三十二载，官从六品到二品，亲民如子，爱国如家，彰显春秋大义，家国情怀，可追寻尊贤尚功的传统、体悟除旧布新的精神，为世人所敬仰。

少年才俊　怀揣鲲鹏志

孙遇生于明朝永乐二年，卒于成化十九年，享年79岁。他自幼天资聪颖，生有异才，3岁时就显露出过人的机灵和敏捷。一次，他看到乞丐偷走母亲纺织的棉布，便伸出小手告诉母亲，小偷逃窜的方向。11岁时，他走在大街上，看到官府贴出来的告示，就能朗朗如流地读给围观的百姓听，并解其大意。官吏发现后，甚为赞赏，便推荐他到县城读书。入学后，他虚心好学，发奋读书，诗词书画样样精通，不久便考中秀才，享有盛名。

“时来高步蟾宫里，始见龙光射斗牛。”孙遇少年才俊、踌躇满志，挥斥方遒、志向远大。宣德十年，31岁的孙遇参加山东乡试，以优异成绩获得乡试第五名举人。次年（正统元年），孙遇进京参加会试，以二甲第二十五名连捷进士，赐进士出身。孙遇官运亨通，扶摇直上，一路凯歌、一路飘红，时为福山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个科考进士，授官职户部主事。一次，他被派往庄粮（今日甘肃省隆得县），为朝廷征收公粮。在往公馆（粮仓）储存的时候，有的官员扬言：“此公馆闹鬼！”言外之意，公馆不宜储存粮食。聪明的孙遇一听就明白其中的玄机。他不仅不相信有鬼神，还把所征收的公粮全部藏于公馆，并且他本人也入住馆内，日夜守护着朝廷的公粮。几个月过去了，一切安然无恙。这时，又有官员说：“他正气浩然，邪恶俱之。”是的，孙遇为官常被封为钦差，所至之处，慎独自律，修己安人，一身正气，声誉卓著，博得了百姓的赞誉，也赢得了朝廷的认可。正统六年，皇上朱祁镇钦点孙遇为安徽徽州知府，为正五品官职。本来户部主事外放官职为六品，而皇帝对孙遇是官衔和官职双提升，彰显了皇帝对人才的识别与重用，也诠释了孙遇立大志、明大德、成大才、担大任的雄才大略。

三品知府，为官三留任

孙遇来到徽州，一方面从古籍里研究徽州的传统文化，从徽学中读懂徽州的历史价值；一方面踏遍徽州的山野乡村，倾听百姓的呼声，体会百姓的疾苦。人心是相关的、相印的、相通的。当地百姓向他坦言：徽州的耕地面积本来就少，可县乡的官田多得种不过来，都荒芜在那里。有的老百姓却手无寸土，长年过着扛活讨饭的生活。有土斯有粮，有粮天下安。了解到这些情况后，孙遇组织人员逐一丈量土地，把多余的官田按户按人分给无田的农户。孙遇的这一举动，赢得了人心，稳定了社稷。

谨言慎行、不失于信、不失于人、不失于义、不失于理，是孙遇为人处事的一贯品行和道德。婺源县有一位名叫妙安的孀妇，被人诬告其投毒杀姑。该县县令偏听一面之词，草率结案，将妙安打入死牢。孙遇查阅案宗后，发现其中的疑点甚多，便微服查访，寻找线索。经过他抽丝剥茧的案情排查，案件终于水落石出，诬告者得到应有的惩罚，妙安获得无罪释放。天下之务，莫大于恤民。孙遇对徽州多年来积淀的冤假错案逐一审理。四乡百姓无不感动和鼓舞，给孙遇送匾“青天父母官”。

正统十四年，正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，孙遇的父亲病逝，噩耗传到徽州，他悲痛万分，立即奏报朝廷，回家守制。

宣德十年，31岁的孙遇参加山东乡试，以优异成绩获得乡试第五名举人。次年（正统元年），孙遇进京参加会试，以二甲第二十五名连捷进士，赐进士出身。孙遇官运亨通，扶摇直上，一路凯歌、一路飘红，时为福山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个科考进士，授官职户部主事。

正统六年，皇上朱祁镇钦点孙遇为安徽徽州知府，为正五品官职。本来户部主事外放官职为六品，而皇帝对孙遇是官衔和官职双提升，彰显了皇帝对人才的识别与重用，也诠释了孙遇立大志、明大德、成大才、担大任的雄才大略。

回归故里后，孙遇创办了孙氏家塾，亲自为子孙授课。他以德立学、以德施教，传授安邦理政的治理之道，传承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，传导格知究理的思想方法。在他的辛勤教导下，子孙博见洽闻，博学多才，科第相接，金榜联芳。

这时，徽州百姓联名上书皇帝，“徽州人民不能三年间没有知府孙遇，恳请皇上恩准‘夺情’”。所谓“夺情”，就是回家丁优守孝期间，因有特殊需要可以不必弃官，持续任职，只是不着公服，以素理事。徽州人民的“夺情”奏折得到了皇帝的恩准，孙遇厚植家国情怀，把孝心埋在心底，把忠心献给国家。他急急赶回故里，又匆匆返回徽州，成为徽州历届知府“夺情”的典范。

做官，就要做刚正廉明的父母官；做事，就要做为民请命的干净事。这是孙遇为官理政的准则和追求。景泰五年，徽州遭受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，春天大旱，秋天大涝，粮食颗粒不收。遭灾严重的休宁、黟县、祁门三县灾民为求苟活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，引发一时的聚众哄抢事件，致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。安徽巡抚会同朝廷下派御史亲临徽州巡察，决定调集重兵平息三县哄抢事件。就在剑拔弩张、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，孙遇急忙上前劝阻：“此饥民耳，一用兵，祸且延。”灾民一时情急哄抢粮食，只不过是饥民求食而已，本应体恤，如果调兵镇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表示愿意拿乌纱帽作抵押，单身奔赴灾区，平息哄抢风波。他来到灾区，召来地方官吏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哄抢粮食，发生在百姓身上，责任在官府，是救灾工作没有跟上。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。孙遇深入实际、调查研究，汇聚民智、集聚民力、凝聚民心，果敢而勇毅地提出五条补救措施：一是各地官吏主动献出自家囤积的粮食，二是设法向四乡的富绅友情借粮，三是立即勒令哄抢粮食首犯将所抢粮食全部交出来，四是请奏朝廷开仓放粮，五是积极组织灾民开展自救活动。他亲力亲为，督察督导，多举措、多渠道筹集粮食，与灾区百姓同心同德、齐心协力，平稳渡过史上罕见的大饥荒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孙遇很快在徽州干满两任。就在这一年，孙遇的母亲病逝于福山老宅。孙遇清廉为官，勤政为民，深受爱戴，大小官员和百姓送上万民伞，第二次联名恳请皇上准许“夺情”和乞留。皇上深解民意，再一次应允并下旨：就地晋职留用，由四品知府晋升为三品知府。实至名归，受之无愧，这是皇上对孙遇的又一次褒奖和肯定。

政绩显，官职升。明天顺八年，孙遇以非凡的才能、超群的智慧、宽广的胸襟、卓越的奉献博得皇上的器重，被提升为江西布政使，官从二品。徽州人民本想第三次挽留，但是想到孙遇的大好前程，便放弃了挽留的念头，怀着割舍不断的情感，赠予“甘棠遗爱”的匾额，并赋诗歌颂其恩德：

治都廉能汉史同，群黎到处乐时壅。
阳回寒谷青生物，清徽黄堂月在空。
瑞麦两岐歌善政，甘棠千载霭遗风。
如今荣满留无计，拟向金门借寇公。

徽州人民把孙遇比作汉代贤臣黄霸、寇恂等人，为纪念他二十载的知府生涯，在今日的黄山市兴建孙遇生祠一座，镌刻下他在徽州为官的显著功绩。

回归故里　教书育子孙

布政使，相当于一省之长，掌管一省的行政事务，并负责上传下达，畅通朝廷政令。

敢于碰硬，勇于亮剑，是孙遇工作魄力和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。江西省南昌府有一位名曰肖彦庄的人在京做官，肖家人就依仗他的权势，横行霸道、欺压百姓、鱼肉乡里、为所欲为，导致民诉不断、怨声沸腾。地方官害怕得罪肖彦庄，不仅不敢管，而且趋炎附势，这就更加助长了肖家人的嚣张气焰。为了一方百姓的安宁，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，孙遇明知这是一块烫手的山芋，却不畏势、不护短、不偏袒，刚正不阿，执法如山，让肖家人在法律面前不得不认罪。南昌府的百姓拍手称快、奔走相告，给孙遇送上了“孙青天”的匾额。可是谁料到此事竟然给他埋下了祸根。

成化元年，孙遇履职河南省布政使。河南省地域辽阔，历史悠久，地处中原，物产丰富，亘古就是战略要地。孙遇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，三年间夙兴夜寐、殚精竭虑，呕心沥血、励精图治，出良策、修水利、定田赋、安民心，赢得河南人民的敬仰和爱戴。正当他奋楫笃行、臻于至善的时候，横祸飞来。成化三年冬，翰林侍读彭华与肖彦庄密谋，弹劾吏部尚书李秉。李秉与孙遇同是山东人，又是同科考取的进士，关系密切，颇有往来。肖彦庄借题发挥，诬告其二人是朋党。明宪宗听信谗言，下旨罢免孙遇的官职官衔。满朝文武都为他鸣不平，但他却不申、不辩，不愿陷入尔虞我诈的官场，毅然决然回归故里。他坚信历史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。

教书育人，是孙遇多年来的夙愿，也是他人生最有意义的归宿。孙氏的家文化底蕴丰厚，上善若水、厚德载物是他们的座右铭，始终坚持以德化人、以德聚魂、以德立身。回归故里后，孙遇创办了孙氏家塾，亲自为子孙授课。他以德立学、以德施教，传授安邦理政的治理之道，传承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，传导格知究理的思想方法。积善之家，必有馀庆。行善积德，泽被后世。在他的辛勤教导下，子孙博见洽闻，博学多才，科第相接，金榜联芳。四个儿子三个考中进士：长子孙珂明景泰五年中进士，任广东道监察御史、大理寺寺丞；次子孙珪，明成化十四年中进士，任礼部给事中、户部给事中、陕西右布政使；四子孙琰，明成化十七年中进士，任中书舍人，尚宝国少卿。三子孙瓒，明成化十年考取举人后，不愿为官，终生研究理学，成为当朝理学大师。其孙孙蘩、孙乐于明弘治十七年同科考取进士，孙蘩系孙珂三子，任直隶任丘县知县。孙乐系孙琰长子，历任浙江秀山县知县、京畿道监察御史、陕西鄜州兵备副使、四川布政使参议。时人曾作诗赞孙遇一门三代六进士：

累朝明宦不寻常，试问家声齿颊香。
皇榜兄弟三玉荀，碧幢父子两甘棠。

芳林新叶催陈叶，流水前波让后波。岁月将“浩然正气、高尚清风”八个字镌刻在孙遇的人生史册上。这八个大字是他为官三十余载的真实写照，也是他言传身教、育子成才的生动诠释。一门三代六进士的千古绝唱，唱出了人世间的真谛：道德传世，弦歌不辍。